

# 陕西大学堂 与西北大学

# 一脉相承

## 编者按:

有关陕西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长期来说法不一。《各界导报》2001年12月8日头版刊发了《陕西大学堂并非西北大学前身》一文,对此姚远先生撰写题为《陕西大学堂与西北大学一脉相承》的文章,提出不同的观点。

值得高兴的是,近期一批清末的原始档案逐渐对外公开,本月7日下午,又有西大历史系教授杨绳信公布了一批自己珍藏的清代末年的原始档案,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陕西的高等教育起源于清代光绪年间;我省建校最早的高校——西北大学的前身确为陕西大学堂。今年西大将迎来百岁生日,搞清陕西大学堂与西北大学之间关系,无论是对陕西数十年来的高等教育史研究,还是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都极为重要。

近日,苗禾田先生在《各界导报》撰文否定陕西高等教育源于清末,认为:陕西大学堂只能列入中等教育,也并非西北大学的前身。这不仅将陕西数十年来的高等教育史研究成果一笔抹煞,其实也反映了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了解甚少。且不说苗文数处错误或多据二手旧资料,单就其立论来说,便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首先,陕西大学堂与西北大学有着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仅据1934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印行的教育部督学《视察陕西省教育报告》,其中有“陕西高等教育机关,于清光绪二十八年,就咸宁长安两县考院旧址,建立陕西大学堂。民国元年改为西北大学预科……”这里,在评价此事上最具权威的教育部显然将西北大学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视为同宗,毋庸置疑。民国元西北大学主办的《学丛》,也曾有多处将自己

的校史沿革溯至晚清。黄福藻在1913年9月所作的《学丛·序》中即明确指出:“本校沿革始于晚清,上而官司文电交驰,下而学课手续之丛杂,几经变折始底于成。兹特将前后事实辑而录之,使后人借以观西北教育史进化轨迹之一斑”。实际上,陕西大学堂在1905年3月改名为陕西高等学堂后,复于辛亥革命后改为陕西高等学校(并未如苗文所说“自行停办”)。1912年3月,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张凤翔,鉴于辛亥革命后西北人才缺乏,提出创立西北大学的主张,成立西北大学创设会,并出任会长,“将旧日之农业、实业两学堂改为本大学农科分校,高等学堂改为本大学预科,以旧日之客籍学堂改为文科分校。其开办常年经费,即用以上各学堂之经费”(引自1913年第1期《学丛》“呈大都督文”)。这就是说,西北大学是秦军政分府于1912年3月,由陕西大学堂(时称陕西高等学校)、陕西法政学堂(即当时酝酿中的关中法政大学)、农业学堂、实业学堂、客籍学堂五校合组而成的。在合组之初,各学堂虽在名分上合一,但实际上尚不完全合为一体,各学堂校长的旧有身份还具有效用,以致西北大学首任校长钱鸿钧还得就重大问题“协同旧日高等学校校长及农业学堂校长,悉心商酌”(《学丛》)。其实,从“西北大学创设会”和最初的主要行政负责人中,更能反映与五学堂根深蒂固的沿革关系。创设委员、首任校长钱鸿钧毕业于陕西高等学堂,留日归国后为陕西法政学堂校长;陕西教育总会会长、陕西高等学堂监督周辅同时兼任陕西农业学堂监督;创设委员中的马凌甫、郝朝俊、谭耀唐、康寄遥、

## □ 姚远

寇鸿恩等均系陕西高等学堂毕业生。高等学堂毕业生担任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和担任西大初期校政或任各科学长者,占其教职员总数的60%以上。这充分说明,陕西大学堂是西北大学的历史源头,奠定了西北大学校政和师资的骨干;陕西法政学堂奠定了西北大学法、政、商学科的基础;陕西农业学堂及袭其址而建的三秦公学奠定了今西北大学的永久校址。因此,五学堂与西北大学实为一脉相承的关系,以致西北大学组成的当年(1912)、第二年(1913)均有学生毕业,就是因为从学堂并入的学生已修业期满,且五学堂的办学经费、行政关系、师资、学生、教育活动、校址等均与西北大学具有连贯的历史承继和递进关系。其实,嫁娶过继,易名换姓,不能否定一个人与生身父母的血缘,同样,时局更替,改朝换代,也不能否定一个组织与其前身的沿革。

其次,陕西大学堂不仅具有高等教育性质,而且在1902至1906年间还如同京师大学堂具有管理各省大学堂的职能一样,具有管理全省学务的职能,这是朝廷御批的,并不为一所中学所具备。一所高等学校,正科未毕业,却培养了一些招自中学生,修业6年,又给予中学资格的学生,甚至开除了—些学生,但他们仍然是从高等学校的大门走出的,不会由于他们的资格或身份而让母校降为中学。反之,某中学培养了一些具大学资格的尖子生,是否就说说该中学是从事高等教育的学校呢?陕西大学堂在1905年改为陕西高等学堂后,确在奏请慈禧皇太后及光绪帝后,“援河南、福建等省高等学堂开办4年暂照中学毕业奖励的先例”,发给学生中学文凭,并奖励出身,实际在校6年多。其实际水平:“于中国经史、文学具有根柢,而地理、算学、博物、理化、图画、体操、英、法、日语,亦皆分科讲习,各有可观,虽比高等稍形不足,而视中学堂程度,殆已远高”(引自曹凤勋光绪三十三年奏本)。在光绪三十二年

(1906年)从日本聘回5名东洋教习后,西学课程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学堂监督也认为:“学堂肄业诸生,不乏聪明可造之士”(《秦中官报》1907)。“堂中科学,乃臻完备”,“中西书籍、仪器标本、衣、械、饮食,无不具备”(《秦中官报》1906)。从高等学堂学生尹钧在《秦中官报》发表的《德育智育体育论》来看,其对德、智、体三者关系的论证,具有相当的中、西学功底,集中代表了学堂学生学贯中西的水平。陕西高等学堂虽无正科毕业生,但已于清宣统元年开办高等正科,至1911年应该毕业的高等正科学生因辛亥革命而推迟毕业,后在西北大学大多补办了毕业证书。学生毕业后,除留学和选送其他大学继续学习外,不少被派充州县学堂的教习,有相当一批学生参加辛亥革命,甚至为推翻封建王朝献出生命,陕西响应武昌起义和张凤翔宣布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的大会就是在高等学堂举行的。在辛亥革命前夕,高等学堂曾数次暴发学潮,或声援他校学潮,动摇了封建政权。第一批留学生即是革命的鼓吹者,归国后也绝大部分成为陕西新政权的领导骨干。

由此可见,不是学生程度不够,而是清政府亏了学生,天下哪有招自中学生(年龄18岁以上35岁以下),学制本来只有4年,却读了6年多,到头来只拿到中学文凭的道理。这就是当时的现实,不仅陕西如此,河南高等学堂、福建高等学堂等数省亦如是。如果依苗文所说,像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到辛亥革命前亦无正科毕业生,仅有120余名预科毕业生)、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南京大学的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等,恐很少有符合其“当代高等”标准者,就连中国古代的辟雍、泮宫太学、国子学、算学、律学,医学等是否在当时具有高等教育性质,恐怕也值得怀疑了。